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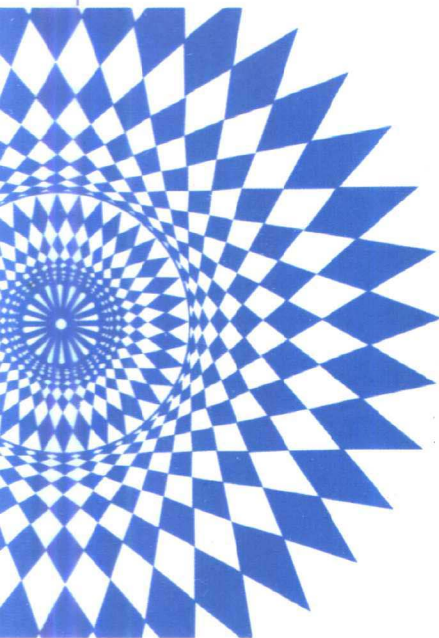


IHUA YU KANGZHENG

已升 化与 抗爭

中国女工工作史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佟新 著



社会学人类学论丛

第29卷



YIHUA YU KANGZHENG

异化与抗争

中国女工工作史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傅新 著

社会学人类学论丛

第29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异化与抗争—中国女工工作史研究 / 佟新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11

(社会学人类学丛书)

ISBN 7-5004-4051-0

I. 异… II. 佟… III. 妇女-问题-研究-中国 IV. D669.6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74319 号

责任编辑 张 红 蒋 微

责任校对 薛超玉 林福国

封面设计 张竞文

版式设计 戴 宽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84017153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盛华印刷厂

装 订 三河海东装订厂

版 次 2003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8.5

插 页 2

字 数 210 千字

定 价 22.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社会学人类学论丛》

编 辑 委 员 会

学术指导：费孝通

主 任：马 戎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长江 马 戎 王铭铭

刘世定 刘 能 李建新

邱泽奇 赵旭东 赵 斌

高丙中 郭志刚 钱民辉

麻国庆 蔡 华 潘乃谷

出版说明

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中国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是在费孝通教授主持下于 1985 年和 1987 年相继建立的,多年来始终在他直接的学术指导下进行教学、科研以及培养新一代社会学者的工作。费孝通教授一贯倡导认识中国社会必须深入到社会实践中去,从科学的调查研究入手。他自己身体力行,无论在选定命题、提出破题思路、理论指导、研究方法和学风等方面,都在实践中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学术发展之路。

遵循社会学学科重建的方针,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按照“实事求是”的精神,密切联系和结合当前中国社会发展出现的实际重大问题,积极以学术研究成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在过去的教学与科研工作中,我们努力迈出了第一步。现在全国人民都为在 21 世纪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我国的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随着社会的发展、经济的腾飞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社会上涌现出了大量的新现象需要我们去研究,出现了大量的新问题需要我们去分析,同时因学科一度中断,有许多社会学研究的基础工作也需要我们不断进行补充与积累。继往开来,今后我国社会学与人类学的研究园地将越来越宽广,社会学人类学者的责任也将越来越沉重。任重而道远,只有奋发努力,再接再厉,才能使我们的学科建设适应中国改革发展新形势的要求,并为推动中国社会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为了学习和发扬以费孝通教授为代表的老一代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的学术思想和踏踏实实的学风,也为了交流年轻一代学者的学术成果,我们汇集了自我所承担“八五”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以来的部分成果,编辑成《社会学人类学论丛》出版,自1996年至2001年共出版30本。今后这一个系列的丛书,将主要包括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密切相关的调查报告、区域发展研究、专题研究成果等等。这些成果不但具有学术价值,而且对于从事具体工作部门的人员也会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与此同时,我们还编辑出版了《社会与发展研究丛书》和《社会学人类学译丛》两套系列丛书,主要结合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学科建设,从相关的学术理论、研究方法、重要专题研究等方面介绍社会学与人类学的经典理论和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之外,我们社会学界的一些同人与华夏出版社共同组织出版了《高校经典教材译丛——社会学》。我们希望,以上这几套丛书的出版将会进一步推动我国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学科建设,促进社会学与人类学的教学与科研工作,并逐步创立扎根于中国土壤、具有中国文化与社会特色同时又能够真正走向世界的社会学、人类学学科。

《社会学人类学论丛》编辑委员会

2001年9月

目 录

导 论	(1)
一 问题的提出	(2)
二 理论挑战	(5)
三 研究方法	(12)
四 本书结构	(15)

上卷 中国女工工作史

第一章 中国女工的出现和发展	(21)
一 女工数量的变化	(22)
二 女工来源与构成	(29)
三 女工的劳动状况	(34)
四 家庭经济支柱和独立的生活	(38)

第二章 独立的政治力量	(42)
一 研究的理论起点	(42)
二 独立的经济诉求	(47)
三 共享利益——被压迫和被剥削的经历	(52)
四 全方位的革命	(54)

第三章 建构出来的妇女解放	(61)
一 日常生活中的解放	(61)
二 革命、解放和工人阶级的话语	(64)

三	女工数量的增减(1949—1965年)·····	(68)
四	阶级身份的建立·····	(74)
第四章	红旗下长大的一代·····	(78)
一	同期群与重要的历史事件·····	(78)
二	女工数量的增加(1966—1980年)·····	(79)
三	女工郭春梅的故事·····	(81)
四	女工李宝萍的故事·····	(90)
五	一代女工的精气神·····	(94)
第五章	纳入变迁的轨道·····	(98)
一	顺应经济结构的调整·····	(98)
二	边缘化的市场地位·····	(101)
三	无产阶级化——阶级与性别的双重作用·····	(104)
四	全球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女工·····	(108)
第六章	结构与历史事件的契合·····	(110)
一	历史重演·····	(110)
二	历史时间与社会结构·····	(114)
三	资本主义与父权制·····	(116)
四	没有走出的时间和空间·····	(119)
下卷 中国女工职业生涯		
第七章	生命历程中的职业生涯·····	(125)
一	生命历程与职业生涯·····	(125)
二	女工职业生涯的嵌入性·····	(127)
第八章	国企女工——“我爱我的岗位”·····	(130)

一	职业经历	(130)
二	工作与生活	(134)
三	职业发展的自我评价	(136)
第九章	国企女工——“我代表咱女工利益”	(138)
一	职业经历	(138)
二	工作与生活	(144)
三	职业发展的自我评价	(146)
第十章	从农村出来的女工——“工作着总是美丽的”	(148)
一	职业经历	(148)
二	工作与生活	(154)
三	职业发展的自我评价	(155)
第十一章	全国女劳模——“人活着就要有所作为”	(157)
一	职业经历	(157)
二	参政的经历	(161)
三	工作与生活	(162)
四	职业发展的自我评价	(164)
第十二章	无法分割的领域——家庭与工作	(166)
一	工作和生活交织在一起的记忆	(166)
二	生命历程的转折点和工作史的重叠	(168)
三	家庭利益掩盖的性别利益	(171)
四	平凡世界——家庭与工作的一体化	(181)
五	理论讨论：走出简单的冲突理论	(185)
第十三章	家庭框架下的性别与阶级的互动	(187)

一	阶级与性别不平等	(187)
二	阶级的代际延续性	(193)
三	自组家庭的阶级地位	(198)
第十四章	职业生涯与身份认同	(203)
一	有限的职业生涯	(203)
二	工人阶级的身份认同	(205)
三	工作的意义	(207)
四	叙述与再现:重构工作的意义	(209)
第十五章	国家力量与女工的策略行动	(211)
一	节日、荣誉称号和国家力量	(211)
二	女劳模的基本特点	(217)
三	象征符号的职业生涯	(221)
四	压力与自主行动	(224)
第十六章	重新定义职业发展——劳动权利危机中的女工	(226)
一	实践中的劳动规范	(227)
二	无法实现的劳动权益	(231)
三	抗争:行动与策略	(234)
四	重新定义职业发展	(238)
主要参考文献		
附录 1:	访谈提纲	(241)
附录 2:	访谈合作者的基本情况	(244)

导 论

抗拒失语就是敢于倾听和应答自己内心真实的声音，就是让自己的感觉、经验、思想进入语言，就是宁可不说宁可沉默也不说那些虚假的不知所云的“他者”语言，就是时时提醒自己不被膨胀的权力话语、商业广告话语所蛊惑和劫持，就是用语言之明朗照自己内心的蒙昧和黑暗，就是从罩在我们头顶的那张失语的大网中突围而出。

刘思谦（荒林主编，2002，3）

妇女史有两个目的：将妇女还原到历史中去；为妇女重建我们的历史。

琼·凯利—加多（王政、杜芳琴主编，1998，83）

本书指的中国女工工作史包括两个部分：一是中国女工自产生之日起到今天的历史，它是女工队伍产生和发展的历史，简称为中国女工史；二是中国女工生命历程中的工作史，是女工作为一名社会生产者的职业发展史。无论是女工史的全部历程还是女工个人的生命历程，女工工作史嵌入在她们身处的历史长河中，并与她们身处时代的工厂制度、工人阶级的整体地位、社会意识形态以及性别话语相关联。因此，本书分为两部分，上卷为中国女工工作史，下卷为中国女工职业生涯。

异化与抗争代表了女工工作史的两大特点。中国女工的命运被国家政治力量、经济力量和社会文化的力量整合进社会变迁过程中，国家利益、单位利益和家庭利益皆塑造她们的职业活动。异化显示了女工工作被各种非自身力量所左右的状况，抗争表达了她们的自主性和能动性。

写这本书是个艰难的过程，从1998年酝酿做中国妇女职业发展的课题开始便处于不断地寻找与摸索过程中。它的艰难在于存在各种各样的风险与不确定性。即使在写完之后，依然觉得想说的话还是有些语焉不详。事实上，我努力想做的事情简单明了，就是想了解和展示当代中国女工的工作和生活。为了知道今天女工的工作和生活，不得不去了解昨天的中国女工，并思考明天她们的工作和生活。首先遇到的困难是语言的无力、不确定和同义词在不同语境中意义的差异性，因为我在努力避免用自己主观的判断去解释女工们的生活，而是力求用她们的语言和她们对工作和生活的理解来说她们的故事，危险在于主流社会的话语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出现。第二个困难是理论上的，当把研究定位于女工时，各种主流社会学理论都显得苍白，她们的生活和工作是那么的多元和充满能动性，僵化的理论无力去解释。因此，我用她们的声音替代了理论，并希望通过女工自己的声音对主流理论进行反思和重构。

一 问题的提出

1949年以后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为女性增加了新的角色，她们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积极参与者。但是在说到中国经济的辉煌成就和1979年后中国经济稳定快速的增长时，“主流”学者们无不把这种成绩归功于党的几代领导人的领导，归功于改革开放政策。然而对于那些每天努力工

作、忙碌的女性劳动者们却很少有人会提到她们在中国发展过程中付出的劳动和做出的贡献。这些劳动着的女性不仅成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主要劳动力（见表1），还是中国社会基石——家庭里的主要支撑者。

表 1 中国劳动力的性别结构 %

年份	女性占总劳动力的比例	女工占工业或制造业的比例
1898	34	—
1914	37 +	—
1933	36 +	40 +
1949	7.5	—
1953	11.68	6.1
1957	—	13.1
1962	—	16.7
1965	—	16.4
1978	32.9	36.6
1980	36.0	39.8
1990	37.7	41.4
1995	38.6	45.2
2000	38.0	43.2

注：①1898—1949年数字统计见第一章。②1990年以前，为女性占工业劳动力的百分比，1990年以后为制造业女性劳动力的百分比。③1953—1965年的资料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85年）提供的这些年份全民所有制工业部门人数和城镇集体所有制工业部门中女职工人数重新计算所得。④1978年后的统计资料摘自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研究所和国家统计局社会与科技统计司编《中国性别统计资料》（1990—1995年）。2000年数字取自《中国统计年鉴》（2001年）。

上述统计数字虽然不够全面，但可以看到中国女工在中国工业化之后一直在劳动人口中占重要比例。长期以来，在“主流”话语中女性劳动力仅仅处于被叙说的位置；在一个男权社会中，女性劳动力成为历史中的“配角”，至多是一个“曾经被三座大山压迫的”、“被解放”的角色；在赞美社会进

步的历史叙述中她们至多是一个“陪衬”。在“正统主流”的实证主义研究中，女性劳动力被简化成为抽象的数字和结构类型；甚至在一些“主流”经济学者的眼中，女性劳动力亦成为商品或工具，她们代表了可以实现的价值和可能的利润，她们是可以被再重构和控制的“劳动力”。在“主流”学者的眼里，女性劳动力的客体地位始终如一，她们是依附于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事实上，中国女性参与社会劳动的积极意义和辉煌成就在于它赋予了女性新的角色，她们不再仅仅是为人女、为人妻、为人母，而是钳工、服务员、干部、教师和经理。这种打破传统两性劳动的分工使女性第一次可以通过社会角色——职业角色确立社会身份，而不用再依靠父亲、丈夫或儿子来确立自己的身份，这是女性从“无我”到“有我”的过程。由此，女性职业发展与其主体性之间建立起了稳定而多元的关系。

本书的研究力求回答这样几个问题：第一，早期女工是如何历史性地出现在中国社会的？她们的工作和生活是怎样的？她们处在中国工业化过程中怎样的位置上？第二，女工是否是政治行动者？她们政治行动的力量是什么？第三，今天的女工与历史上的女工相比较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她们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是否具有根本性的改变？第四，新中国的建立和妇女解放到底对妇女意味着什么？第五，在妇女解放的根本出路是她们参加到社会公共领域中的思想影响下，女工获得了怎样的工作经验，这些工作经验对女工有怎样的意义？第六，改革开放所进行的经济结构调整对女工意味着什么？女工如何应对经济变迁？她们是“弱者”吗？第七，对于女工来说，工作和家庭真的是双重负担吗？她们是如何看待工作和家庭的？第八，女工的阶级属性是怎样的？她们与丈夫、父辈之间的阶级互动是怎样的？如何认识中国女工的阶级属性。

二 理论挑战

2000年，我获得全国妇女理论研究会的支持从事了一项有关“中国妇女职业发展”的课题研究。这是对现代中国女性职业发展现状的研究，集中思考了三个问题：妇女的共性与差异性问题；女性劳动者的主体性问题以及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

（一）挑战之一：共性与差异性

研究的第一个挑战是有关妇女的“共性与差异性”问题，即妇女在时间和空间上是不是一个独立的利益整体？女工个体的经验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归纳为整体的经验。个人的经历如何上升为整体的性别的或阶级的体验与觉悟，这是本研究力求解释的一个问题。

在展现中国女工史时，首先面对的是不同历史条件下的女工；第二面对的是女工与其他职业类别的女性劳动者；第三面对的是女工与男工之间的共性与差异。

从时间的角度看，不同历史时代的女工有着不同的工作经历，其共性是历史性的。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再到社会主义建设和市场经济，中国女工同男性们一起经历了伟大的社会变革。在以“劳动光荣”为使命的时代，出现了“男女都一样”的创举，在那样的一个时代是否真正消除了两性间的性别差异使两性工人得到全面的发展呢？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女工与男工一样经历了社会经济的结构性调整，社会异质性程度提高，工人阶级遭遇历史的命运。阅读各种各样的文献资料，仿佛走进历史的长河，女工的故事是河岸上多姿的风景，她们当下的生活正是明天的历史，但如果不对她们今天的生活和工作进行记录的话，她们很快就会消失在时间的长河中变得无声无息，就如同我在努力

寻找 20 世纪 50 年代女工的资料时感受到的：我们无法知道大批的家庭主妇走向工作的过程是如何发生的，这些妇女无声地走过历史。我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在 50 年后重演，因此尽力留下可能依然是微弱的声音和几个普通女工的故事，关注的问题是女工的工作和生活是如何历史性地嵌入在中国工业化进程中。

从社会分工的角度看，职业女性的生活境遇有天壤之别，妇女是个广义的概念，因为妇女本身有着阶级、城乡和教育背景的差异，这种差异使我难以用整体妇女的概念来论述其职业发展。我至少要把妇女分解为知识女性、女干部、女工和农民，这仅仅是职业类别的划分，还不包括地域的分化，她们之间职业发展路径是不同的，因此在进行细化研究时把研究定位于中国女工——工业企业中的女性工人。但妇女之间也有共性，2002 年有调查表明，有 30.5% 的女性认为，她们最大的压力是“经济”上的，其次是“工作压力”，占 28.55%；“工作和家庭难以兼顾”的占 9.69%（华坤女性调查中心，2002）。可以看出，无论是怎样的阶级或阶层处境，女性最大的压力来自与工作相关的日常生活，总计比例占到 69%，这些压力是身为女人所面临的共同境遇。因此我一直寻找女工的共同点：她们的工作经历、她们的工作渴望、她们给予工作的意义、她们感受到的工作和生活的压力、她们的成就感和挫折感等等。

在工人阶级的成长过程中，女工是否是一支可以独立于男工的力量？这是阶级与性别的交叉和重叠，对此不敢轻易下结论。中国女工的发展和变化与工人阶级整体命运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它是深深嵌入在中国工业化的历史、经济制度、家庭结构以及有关价值的社会话语之中的。

（二）挑战之二：什么是女工的自主性和能动性

研究的第二个挑战是“自主性和能动性”问题。本研究的初

衷是想说明女工是行动的主体，她们通过各种职业策略来实现对各种异化力量的抗争，那么女工的“主体性”和“能动性”是什么？如何展示女工自主性和能动性呢？

“我思故我在”，这是哲学家笛卡尔对“主体性”的清晰表述，强调的是自我的意识。在西方形而上学的哲学框架中，德国古典唯心论发展出的“自我意识的运动”突出了对“主体性”的认识，他们提出的主体性概念包含着对人性的体现与思考。后来的一些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以“生活世界”的概念超越德国古典唯心论，把主体性作为内涵更为丰富和深刻的范畴来研究，“主体间性”或“交互主体性”伴随着对于“生活世界”的重视成为新的重要的哲学课题。胡塞尔在“生活世界”和“交互主体性”思想中突出“交往”和“有效性”的视角，随后哈贝马斯提出“交往理论”，强调从语义学的角度理解主体性，减弱了对于交往活动中真实互动意义的理解，强化了语言的作用和意义。由此，对主体性的认识可以沿着这样一个脉络：第一，主体性是与自我意识相联系的；第二，主体与客体之间并非是绝对的关系，而是相对的关系，存在交互主体性；第三，主体性是呈现在日常生活世界的真实互动；第四，主体性主要地呈现为意义世界，并借助语言表达出来。本研究强调主体性呈现在日常生活世界中的互动关系。中国女工主体性是她们相对于国家、男权社会、经济霸权、传统文化力量的个人存在。

长期的父权制文化使中国女性不仅是沉默者，而且还是附属者。中国文化中的父权制通过父系继嗣、从夫居和男女有别，使女性通过婚姻在家庭中处于依从地位，并决定了她们在社会中的从属性。女性一出生就注定要附属于她未来的丈夫，女性终生要对家庭为她挑选（包办婚姻）的合法丈夫保持忠贞；无论丈夫怎样对待她，她都不能与他离婚；即使丈夫比她先去世，她也不能改嫁；但她的丈夫却可以娶多个女人或再婚。这些成为中国文化